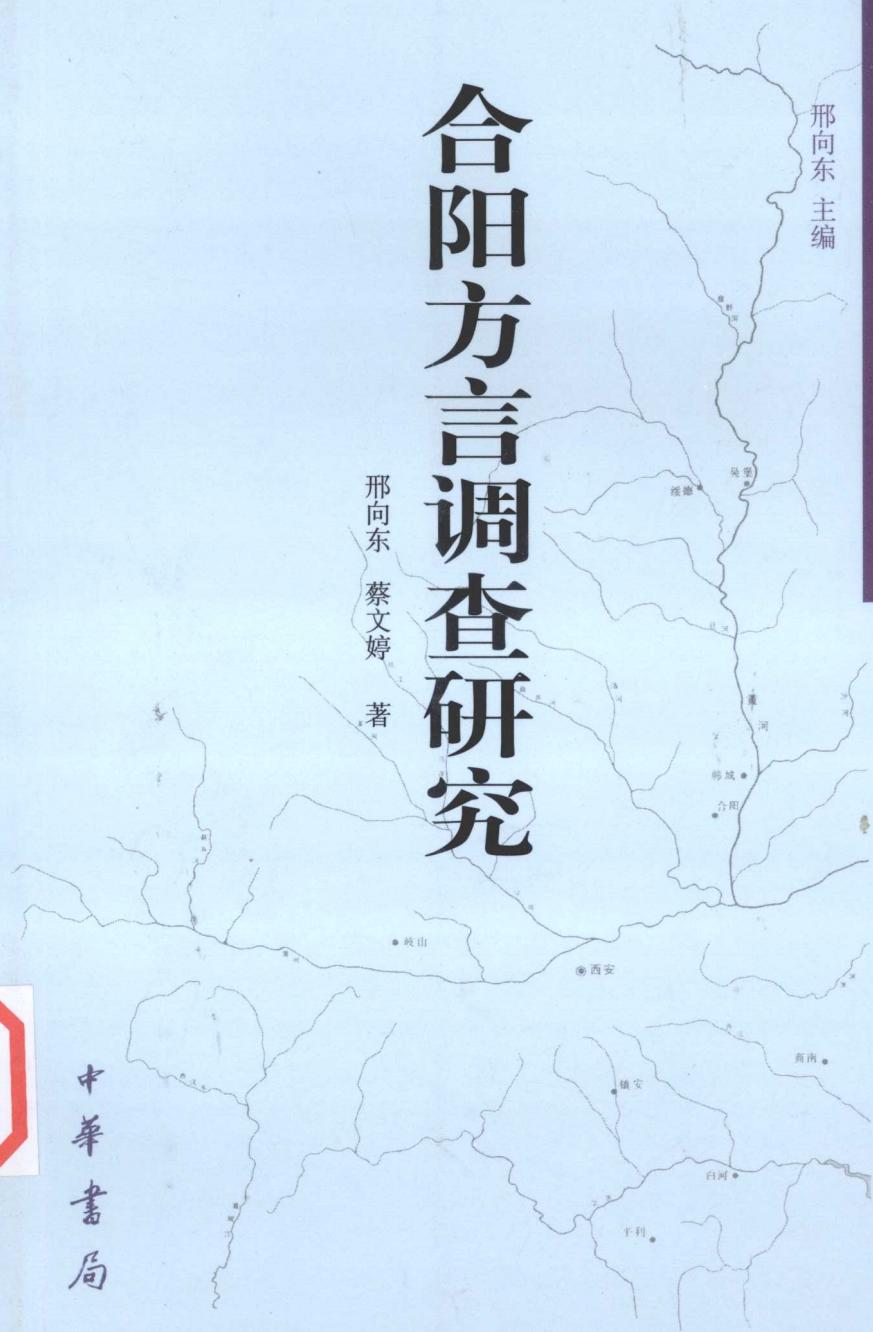


— 陝西方言重點調查研究 —

邢向東 主編

合陽方言調查研究

邢向東 蔡文婷



H172.2
29

国家“211 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奖者专项基金资助项目(200409)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
邢向东 主编

合阳方言调查研究

邢向东 蔡文婷◎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阳方言调查研究/邢向东,蔡文婷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7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

ISBN 978 - 7 - 101 - 07231 - 0

I . 合… II . ①邢… ②蔡… III . 西北方言 - 调查
研究 - 合阳县 IV . 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4717 号

书 名 合阳方言调查研究

著 者 邢向东 蔡文婷

丛 书 名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

责 任 编 辑 秦淑华

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1/2 插页 4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1 - 1000 册

国 际 书 号 ISBN 978 - 7 - 101 - 07231 - 0

定 价 38.00 元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工作委员会

顾问:霍松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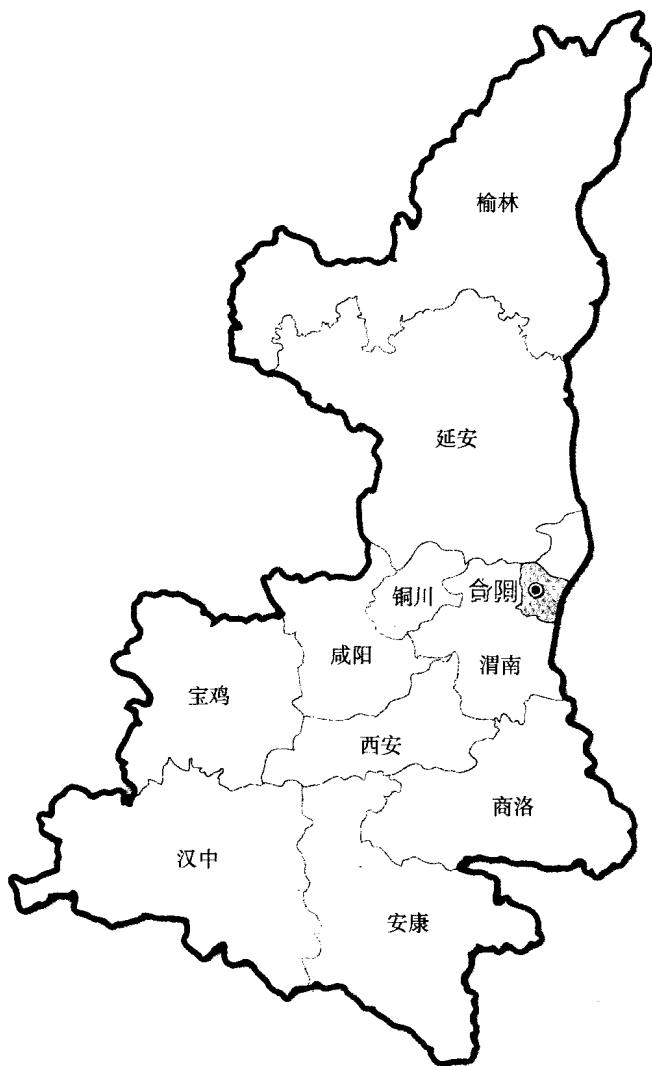
主任:李西建 张新科

**委员:邢向东 赵望秦 霍有明 刘锋焘
赵学勇 李继凯 尤西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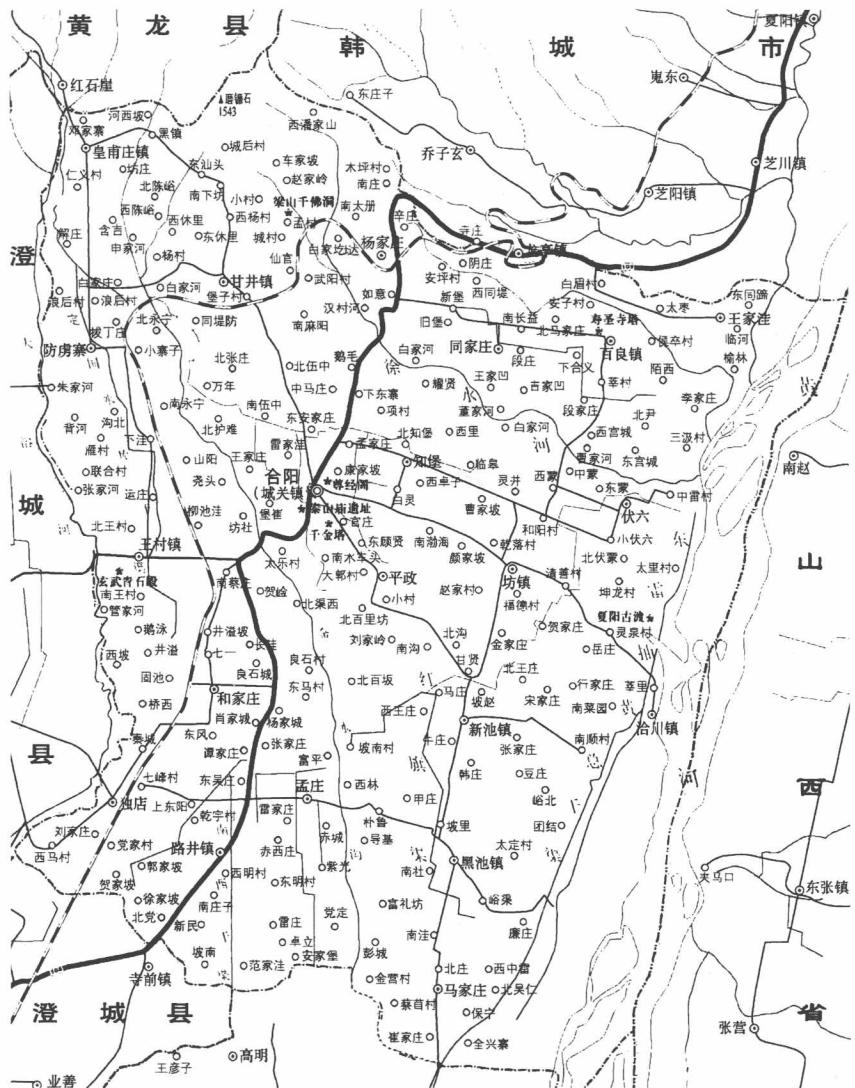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

顾问:钱曾怡

主编:邢向东



合阳县在陕西省的位置



合阳县

总序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13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1100余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首先，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长安和周边地区为核心，以黄土为自然生存环境，以雄阔刚健、厚重质朴为其主要风貌，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中国文学的“陕军”、中国艺术的“长安画派”等，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后长安时期”的文化。其次，它是一种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再次，它是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此期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第四，它是某历史时期全国的主流文化。由于长安是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以长安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文化，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产生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是中国文化之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长安文化进行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更有了一新的起色，尤其是“长安学”“西安学”的提出，为长安文化的研

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并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研究长安文化是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深入挖掘长安文化的内在价值，探讨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藉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之机，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申报了“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本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的研究，并且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

本方向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研究。（1）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2）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3）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古今文学演变。以长安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长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

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还流播海外,对日、韩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征。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长安与西北文化

本研究方向立足于长安文化,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有:(1)西北重点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从汉代开始即对西北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在唐代以后持续不断,明清两代更有加强。因此,西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极其密切。从古代直到现代,西北的汉语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的任务之一。(2)秦腔与西北戏曲研究。在长安文化的大视野下研究长安文化对秦腔及西北戏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以秦腔及西北戏曲为载体,研究戏曲对传播长安文化所起的作用,从而显现长安文化在西北民族文化精神铸造中的巨大作用。(3)西北民俗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主要研究西北民俗文化特征、形态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影响,研究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研究,对西北方言史、官话发展流变史、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号称中国梆子戏家族的鼻祖,是长安文化的活化石。秦

腔诞生于陕西,孕育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受到西北五省人民的喜爱,已经被选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西北民俗的中心在陕西,陕西民俗文化是西北民俗文化的发源和辐射中心地。陕西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对社会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陕西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作为最早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对于这些遗产进行整理、保护以及利用,不仅可以加速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可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第三,长安文化经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本方向对长安文化经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有:(1)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完成《十三经辞典》的编纂任务。之后,再进一步进行十三经的解读与综合研究,探讨经典文化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2)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本项目拟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如重要作家的诗文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十三经与长安文化关系密切,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诗》《书》《礼》《易》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十三经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外,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均有保存。许多文人出

生在长安,或游宦到长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长安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研究长安文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

围绕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对长安文化进行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长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有开拓性的认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三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拟把研究成果以不同的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启动的有《汉唐文学研究丛书》《长安学术丛书》《长安文献资料丛书》《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等。《十三经辞典》已经出版十卷,我们将抓紧时间完成其余工作,使其成为完璧。总之,通过“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项目的实施,我们要在学术上创出新特色,在队伍上培养出新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家与地方文化建设和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22日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

前　　言

陕西省按照自然地理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区域。就方言来说，陕北有古老的晋语，关中有曾经作为共同语重要基础的关中话，陕南有多种方言并存，堪称方言调查研究的富矿。

陕北方言是一支非常古老的方言，其中有 19 个县市区方言保留入声韵和入声调，属于晋语。陕北方言词汇中有许多古语的遗存和特征性词语，如：冻（阴平，冰）、梢（树枝）、平斤（饼子）、衿（系）、炕（把东西放在炉盖、锅底等地方，用慢火炙干）、植[*tʂəʔ_s*]（庄稼种得早，又指人的生月早）、稊[*tsi³*]（庄稼种得晚，又指人的生月晚）、宬[*ʂəŋ*]（住）、钞（用筷子、羹匙取食）、炮（熄灭）、脑（阳平，头）、猴（小）、烧（去声，霞）、照（看）、教（让、允许）等^①。语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如：存在表先事时（或认为过去时）、后事时（将来时）、当事时（现在时）的完整的时制系统；有极其丰富的表达虚拟语气的助词。

陕北晋语分别属于晋语五台片、大包片、吕梁片和志延片。语音上既有一致性，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入声的有无是

^① 见刘勋宁《现代汉语研究》101—108 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年；邢向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13—14 页，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将晋语与周边方言分开的鉴别标准,其中府谷、神木、吴堡等保留最完整,绥德、榆林、佳县、清涧等次之,延安(宝塔区)、延川、甘泉三县区最少,只在口语中保留部分入声字。陕北晋语中,沿黄河一带的方言存在复杂的文白异读,吴堡、清涧话最难懂。绥德话最有权威,对其他陕北话有较强的辐射作用,可以说是“陕北的普通话”。处于晋语和中原官话过渡地带的延安、甘泉等方言,有许多过渡方言的特点,值得进行“地毯式”的细致考察。

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在汉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周代,“雅言的基础应该是王畿成周一一带的方言”^①。现在多数人认为雅言的标准音是河洛语音,但关中地区作为西周的京畿所在,其方言当属雅言基础方言的一部分。汉代,今关中地区的方言与晋南话合称“秦晋方言”,是非常强势的方言。周祖謨先生认为“汉代的普通语恐怕是以秦晋语为主的”^②。唐代的长安话尽管可能不是当时共同语的标准音,但也应是共同语基础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③。从唐宋西北方言和现代西北方言、山西方言研究的成果来看,那时的关中方言,大概属于范围广大的“西北方言”。历史上,经过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北方少数民族及其他地区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入境,长安及关中地区的居民变动很大,现在的关中方言和汉唐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

①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17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

② 见周祖謨《方言校笺》10—11页,中华书局1993年。对这一点还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如李新魁、郑张尚芳、何九盈认为,汉代通语的标准音应当是河洛音。

③ 李新魁、郑张尚芳、何九盈等先生认为,唐代标准音为河洛一带方音,笔者赞同此说。见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1980年第1期,又载《李新魁自选集》150—167页,大象出版社1993年;郑张尚芳《中国古代的“普通话”》,《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6日;何九盈《汉语三论》160页,语文出版社2007年。

的变化^①。时至今日,关中方言还处于活跃的演变状态。因此,关中方言史的研究是官话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中方言词汇中有不少特征性的词语,如:颙[^csa] (头)、□[^cnou] (停留、呆在某地)、嫽(好,陕北话也说)、善[^cts‘ a] (好、合适、舒服)、毕(完)、碎(小)、惜(形容女子和小孩儿貌美、可爱)、争(厉害)、扎(表程度高的副词)等。语法上的显著特点是:少用程度状语,代之以程度补语,如“嫽得很、嫽得太(太)、嫽扎了、美得很、美得太(太)、整扎了”。

关中方言内部的一致性较强,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比如,中古全浊声母仄声字的今读、知系声母合口字的今读、端精见组声母今齐齿呼字的读音、古泥来母字的分混、古山臻摄精组合口一等字及合口三等字的今读、古深臻摄与曾梗通摄舒声韵的读音等。就方言区划来看,西安、户县、咸阳、渭南、铜川等关中心地带方言(以及洛川、黄陵、商州、汉滨、洋县、城固等共43个县市区)属于中原官话关中片;宝鸡(金台区)、凤翔、岐山等西府话(以及勉县、略阳、富县、定边等共19个县市)属于秦陇片;东府地区沿黄河的宜川、韩城、合阳、大荔话,与对岸的晋南方言非常接近,属于汾河片^②。

陕南地区错综分布着多种方言,格局最为复杂。其中,汉中市境内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深度接触,安康市境内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黄孝片深度接触,并有赣语怀岳片方言岛、湘方言岛存在,商洛市境内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黄孝片深度接触,并有不少

① 有人说用关中话读唐诗,比用普通话更押韵、顺口,以为现代西安话就是古代的长安话。这种说法反映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因而不足为据。其中有三重误解:第一,首都的话就是普通话的标准音;第二,唐长安话就是唐代的普通话;第三,唐代长安话到现代西安话变化不大。

② 关于陕西方言的具体区划,请参看邢向东《陕西省的汉语方言》,《方言》2007年第4期。

赣语怀岳片方言,还有来自广东的客家话。陕南的“本地话”应当包括中原官话和一部分西南官话,是原住民和明代“荆襄流民”运动中安置下来的移民所操的方言。另一部分方言如江淮官话、赣语、湘语(包括部分西南官话)等是清代乾隆朝及以后由湖广、江南、四川等省的移民带来的,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①。由于南方移民生活环境的封闭性,有些方言还顽强地保留着“源方言”的基本特点,但也无可避免地同陕南原有的方言产生互动,彼此影响、交融。陕南方言格局的形成,与自然地理、历史行政、移民运动都有关系,是研究方言接触、融合的绝佳标本,也是社会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用武之地。

总之,陕西的方言资源极其丰厚,形态各异,是一座值得大规模开采的宝藏。对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等,具有独特而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而,陕西方言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比之国内其他方言,调查研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国语言学的快速发展,陕西方言研究逐渐走出沉寂,活跃起来。陕西方言中深埋着的无价宝藏,渐渐露出庐山真面,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缺陷制约着陕西方言研究整体向纵深发展:一是方言点上的系统成果不多,深入挖掘不够;二是缺少一个既能人人独当一面、又能集体攻关的团队。2004年,我的论文荣幸地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并入选教育部

^① 南来方言中,江淮官话黄孝片、赣语、湘语等可以按照商洛市不少县志的称呼,统称为“下湖话”。我们认为,“下湖人”是陕南人对清代湖广、江南等省移民的笼统称呼(包括自称和他称)。由于南部迁来的江淮官话、赣语等方言将一部分中原官话的[u]韵字读成[o]韵,所以当地人(包括移民自己)把“下湖话”讹称为“下河话”,正如把“客户”讹称为“客伙”一样。对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考察。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这真是一个提升陕西方言调查研究整体水平的绝好机遇！于是，申报课题时毫不犹豫地确定了《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的计划，课题组成员包括近年来颇为活跃的陕西方言学者和一部分博士生、硕士生。根据方言特点、分布和现有的研究力量，选定了 10 个方言点，由主编制订统一的调查表格、写作大纲、研究步骤，经课题组集体讨论，作为研究的共同提纲。考虑到陕北、关中、陕南方言存在很大的差异，课题组成员又各有特点，同时，各个方言点已有的研究基础也不同，因此，在具体地点的研究中，又给各位子项目负责人相当大的自由。作为主编，我们给自己也定了规矩：所有成果都必须亲自审稿，参与修改，对每一部书稿的质量负责。这样，采取既统一又灵活的研究机制，以最大限度地调查、描写方言事实，最大限度地挖掘方言事实的理论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位研究者的特长。最终目标是制作高质量的精品，从整体上提高陕西方言研究的水平。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课题立项后，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关注。钱曾怡先生应允作为项目的学术顾问，对项目的研究大纲及其实施提出了一些切实的建议，强调要突出方言事实的调查，加强研究成果的整体性、系统性；还亲自审稿，对书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并为《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丛书作序。本课题在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奖者专项基金资助的同时，又被纳入陕西师大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计划，得到学校和文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各位子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也在调查、出版方面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主任秦淑华女士热情支持这套书的出版，并在如何提高成果质量方面给以具体的指导。对以上各位先生、单位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现在,《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丛书就要陆续面世了,我们期待着来自学界的批评、指导。

邢向东

2008年5月20日于陕西师大